

对话

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峰：

行业类高校国际交流须前瞻性布局

■本报记者 陈彬 钟华

不久前，第二届中俄交通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交通大学召开，来自中俄两国60余所交通类大学校长共100多人出席了论坛，就两国交通领域高等教育及两国交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去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中俄交通大学校长论坛上，中俄交通大学联盟宣告成立。面对“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以北交大为代表的行业类高校应该在对外交往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峰。

教育应先于企业“走出去”

《中国科学报》：近些年来，我国对外交流的步伐正在加大。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扩大开放发挥着怎样不同的作用？

陈峰：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大开放可以说已经是一项国家战略，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以后，我国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任务，这也是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应该说，近年来在我国的对外交流中，教育交流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更可以被看成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因为在凸显一个国家文教软实力的过程中，人们对教育成果的评价是根据人才数字进行衡量的，而高等教育基本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最后一环，但它反映的问题却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问题。

因此，不论我们的教育体系在之前的各个环节中存在什么问题，高等教育都必须要有全球的视野，要有国际标准，这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人才标准趋同化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新挑战。换言之，在我国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的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符合世界人力资源标准人才的重任。

《中国科学报》：众所周知，北京交通大学是一所行业特色极为明显的院校。这类院校在我国“走出去”的进程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峰：对于行业类院校而言，特别是对于学科特色特别明显的院校而言，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行业特色院校就曾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改革开放后，多数院校依然保持这一特色，这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优势。

记者快评

『强买强卖』折射校园民主缺失

■温才妃

上学期刚办理了中国电信的宽带，一开学，却被学校通知必须更换为中国移动的宽带；重新办理之后发现，不仅收费标准变了，连无线路由器也成了“禁用品”。这是武汉某高校学生新学期的遭遇，其背后揭示的问题则是高校里的强买强卖行为。

这些年来，高校里的“强买强卖”已经从强制购买被褥、军训服，转移到了网络运营商、科技产品。相关高校往往是在打着“自愿”的旗号，但行“强制”之实。一旦被媒体曝光，就搬出“自愿”的说辞来，殊不知，学生只是被动接受，却无选择的机会。

高校之所以强买强卖，其背后的原因并不难作猜想——高校与运营商有利益上的合作。在这条利益链上，高校处于顶端，运营商次之，学生是末端的牺牲者。所谓的“牺牲”不只在于学生的经济损失、被剥夺的选择权，还在于身教带来的不良影响。一个以育人作为第一目标的机构，在言行身教中误导学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让我们看看行业中的一些行为，打官司，法官与律师分庭，左右审判结果，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缺失；药品供应商与医院分成，动辄开高价药品，医院成为很多家庭在经济上的“噩梦”。作为育人场所，高校不应该把不良风气带到社会上来。

如何阻止强买强卖行为的发生？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是眼下最好的选择。目前，我国的《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均对强买强卖行为有法律上的界定，不要因为事小，而忽略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

当然，要根除高校里的强买强卖，更加必须根除的是国内高校心中“自视甚高”的种子——中国高校无论在大事小事上似乎都很少征集学生的意见，即便有征集，在多数情况下也只是个象征行为，更像是一场民主的作秀。实际上，大学生是有判断能力的成年人，轻易唬弄不得；同时，大学生也是更具创新能力的一代人，他们的建议也不乏见解。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高校的事务管理中，让他们真正成为高校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命令的被动接受者，对于他们才是最好的尊重与信任。

同时，也希望无论是“985工程”“211工程”，还是普通高校的大学生都能更有校园民主的意识，而不是“从入学起，只关心就业与兼职”。



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重大战略也需要学科特色优势明显的学校发挥自身作用。仅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例，在这一重大战略中，中国高铁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快实施战略的重要工具。而行业特色院校正好切合了我国高铁“走出去”的需要。

其实，中国高铁“走出去”早在几年前就启动，但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走出去的速度要比教育走出去的速度快得多。这带来的问题便是因为缺乏本土化的人才培养，很多国内企业在国外完成重大工程后，必须留下一批人，因为当地人难以完成工程的后期运营，这就是教育没有先行所造成的后果。

因此，发挥行业院校的作用既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也是行业院校做好自身定位的重要标准。在我国不断加强对外交流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国的高校没有相应作为，这也是一种失职。

“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中国科学报》：为了发挥行业院校在国家

“在我国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的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符合世界人力资源标准人才的重任。

对外交往中的作用，我们应该作哪些努力？

陈峰：我们首先要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一定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成人力资源强国。因为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我们有充足的后备人才资源。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引入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留学生，培养他们知华、友华、亲华。当前，我们要有这样的前瞻性布局。事实上，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这样的布局，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该项工作在推进速度上并不是很理想。应该说，这也是高等院校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和义务。

在国家大力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国际化不是简单的开放市场，更不是单方面引进西方教育理念，而是将“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步化。通过这种结合所产生的身份转变，扩大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以后的教育输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人看来，目前国内很多高校的大量对外交流项目，总给人一种浮于

屠呦呦获诺奖能否说明“举国体制”优势

■熊丙奇

现代科研环境。行政计划性质极强的科研举国体制，在推行中可能催生急功近利，把学术研究活动变异为学术资源、学术利益争夺，结果并不能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反而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我国在举国体制下取得的世界级成果，与不实行举国体制的英美等国相比，有多大差距呢？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到2012年，37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中有23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在美国从事了大部分研究的人；在3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有26名是美国科学家；40位物理学奖得主中有22名是美国公民或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科学家。而我国迄今为止只有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

我国目前的科研是由行政主导的，从科研项目立项到科研管理、评价，都实行行政管理、行政评价。科学研究的正常逻辑是得到项目经费，利用经费全身心投入研究，由学术界评价学术成果。而目前的科学研究却出现另外的逻辑，全力以赴获得项目，把获得项目作为学者和学者所在单位的荣誉，不认真开展学术研究，对成果进行包装，再去申请国家奖项，并以获得的项目、国家奖项为基础，再去申请新项目，获得新的经费资助。这样的逻辑之下，科研出现“说过了，就做过了，做过了，就做好了”，以及“重立项、轻研究”的怪现象。由于大家都展开经费和

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民办高校应成为一个稳定基础的事业。

在专业发展上，突破社会有什么需要就办什么专业的模式，而是逐步把现有的专业稳定下来，并在优势专业上实现有效、合理、有计划的发展。不考虑办学基础，引进一批教师，开办了市场需要的专业，随着市场变化，有的专业开设不到两至三年招不到学生，有的专业，一年招生才几个人，无法进行教学，这样的专业规模是没有任何办学效益的。众所周知，当专业规模达到30个以上时，从转型发展要求来看，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就要形成一个聚焦式的学科专业结构，用核心学科专业来建立办学体系，包括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等，这样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形成办学实力。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注重师资的培养，使教师队伍在层次上逐年有所进步和提高。培养和引进众多的“双师型”师资是关键。对此，学校要加强对教师培养，引进管理和使用，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国内外一流名校做访学或进修，鼓励现有教师继续深造，攻读硕博或到企业、事业单位挂职学习或实践

表面的感觉，不知您是否有这种感觉，您觉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陈峰：这种感觉的产生，源于我们缺乏对相关师生的深层次能力的培养，这导致他们的交流能力受到限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我们的很多对外交流项目中，行政推动的力量比较强。换言之，促使大家从事某一对外交流项目的，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内在需要。

国外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通常是参与者本人认为某项工作非常重要，自己一定要做，而且做完之后也能给个人和学科带来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中国的很多做法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就难以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从而产生一种难以深入的感觉。

一项长期的事业

《中国科学报》：在今年的中俄交通大学校长论坛上，众多交通类的高职院校获邀参加。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陈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行业特色院校应该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服务。所以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抓紧时间促成中俄双方交通类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深度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一批懂俄语的中国学生，以及培养一批知华、友华、亲华的国外留学生，为将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作准备。

在中俄双方的教育交流中，本科类院校的学生其实更愿意去欧美等教育发达国家留学深造，反倒是高职类学生到俄罗斯留学甚至升本的意愿更加明显。在留学期间，这些学生基本都能掌握俄罗斯当地语言。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旦有中国企业在独联体国家承揽工程，这些既懂技术，又懂双方语言的人才，将成为基层建设中的骨干。

《中国科学报》：这就是您所提到的提前布局，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服务？

陈峰：是的。从明年开始，我们还将非洲和南美洲布局，并计划在非洲建立中非交通大学。这类高校的培养目的也不是大量培养硕士、博士，而是培养适合当地需求的技术人员。因此，我们还会联合高职院校参与此项工程，使得各类高校在中非大学中能够各尽所能，服务于非洲。这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资源的争夺，并不重视学术研究过程，因此，学者的身份、头衔、人脉关系就变得极为重要，在科研经费配置中，有显赫学术头衔，或者行政职务的人，往往占有绝对优势，而有学术能力完成具体学术研究者，却很难拿到项目和经费。

屠呦呦当时进行青蒿素研究时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举国体制也出现了后遗症，最突出的就是成果归属一直没有定论，导致屠呦呦的成果在国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就在她获得拉斯克奖之后，争议还没有平息。这也是目前国内科研存在的问题，所谓科研“五同问题”：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产生分歧“同室操戈”，最后走向“同归于尽”。另外，屠呦呦多次参评院士未成功，某种程度也暴露出我国目前的学术评价不是坚持学术标准，而受到利益因素的干扰。

政府在科研中当然有重要作用，但却不适合直接参与科研。行政直接参与科研、主导评审，会导致科研严重行政化、利益化，以行政和利益标准代替了学术标准，不利于鼓励科研人员平等竞争。我国应该探索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术自治、学术同行评价的现代科研管理体制，而不是还把科研创新的希望寄托在“举国体制”。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民办高校发展如何转型

■许青云

锻炼，以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同时，要改革校内教师绩效评价和考核机制，适应健全以应用性科研成果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和教师职称评审成果。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建立内涵丰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有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具体高校的应用型人才的定位。民办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定位放在最低端，还是定位在相对的高端？正确的答案是要不要趋同化，千校一面，而是要根据办学条件、实力增长的情况来不断调整，根据各个学科专业的办学实力来区别对待，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应用型的要求。

在制定民办高校大学章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不能盲目仿效公办高校的管理模式。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比，其最大优势表现在有可能最先在制度方面实现现代化。民办高校不能以维持当前运行为目标，不能套用企业化的管理方式，要用现代大学制度来提升民办高校的办学实力和竞争力，才有助于转型为精细化、高水平的发展形态。（作者系平顶山学院教授）

高教观点

近日两则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新闻颇能反映出中国教育改革存在的尴尬处境。一则是：黑龙江某高校出台政策，新入学硕士研究生缴清学制期学费，享受全款的九五折优惠。此举成因新闻没有提及，抛开深层动机不谈，这则信息直观反映了高校目前普遍缺钱，而且已经到了不惜打折预支的窘迫境地。另一则新闻同样令人震撼，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15届毕业的231名统计学硕士中，有近200人是中国学生，占总数的80%以上，有人戏言，哥大统计系被中国学生承包了。众所周知，像哥大这样的著名大学学费不菲，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拥有庞大的研究生生源潜在市场和巨大的教育支付能力。这两则新闻连起来看，恰好能反映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扭曲：端着金饭碗要饭吃。

中国高校的运营经费来源，大体有三大块：政府财政拨款、学费以及各种创收收入（著名高校还有可能获得各类社会捐赠、融资等）。而大多数普通高校的创收与捐赠收入非常不确定，真正稳定和靠谱的经费来源渠道只有财政拨款和学费。在国家总体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以及招生自主权严格管控的背景下，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化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状况直接制约了高校的正常发展。在政府与市场的错位配置中，就出现了难以克服的改革表证综合征，即中国大多数的改革仍然停留在形式层面，根本没有触及到改革对象的实质结构，因而出现了改革口舌震天响，改革成效乏善可陈的怪现象。为了彻底扭转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顽疾，需要真正触及改革实质：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对于教育体制改革而言，就是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针对运营经费短缺的局面，只有适当放权，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校自主招生，学费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方可极大地缓解运营经费紧张的局面，从而真正实现高校运营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改革构想。

依托市场解决高校运营经费短缺局面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这得益于中国公众的传统文化认知与积累的经济基础：其一，中国文化比较重视对孩子教育的投资，这种传统历史悠久；其二，中国高等教育目前仍处于卖方市场，这个基本没有改变，即供给有限，需求巨大，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这也预示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据测算中国出国留学市场价值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2013年中国留学人数为41万，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和本科生及以下的留学人数比例约各占一半，如此算来，仅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市场价值就约为1000亿元。如果这些“出口”的研究生有三分之一转“内销”，也意味着300亿元的市场份额。以上文提到哥大统计学研究生为例，相信国内也有很多大学可以培养统计学硕士研究生，毕竟硕士阶段还没有涉及太多的高精尖前沿问题，如果国内学校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招生权和学费定价权，那么，国内高校也可以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的。如果能成行将极大地缓解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局面，同时也可以借此激励高校注重教学。遗憾的是，当下的教育体制既不能给高校比较充分的财政经费支持，又不允许高校拥有招生的自主权和学费的定价权，因而，就出现了端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局面。

当下所谓的鼓励高校运营经费来源多元化的倡议，在没有实质性的结构变革之前，就是一句漂亮的空话。由于中国社会没有捐赠高校的习俗与偏好，因而，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能从社会上获得大量捐赠，也不是所有学校都有能力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高校所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教育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体制冻结，高校也就基本丧失了任何改变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社会，高校转变需要经费支持，但它所拥有的唯一能够用来换得收益并改变自身状况的资源又被冻结，稍有作为就触碰政策红线，因而，只能眼睁睁地陷入退化模式，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放大作用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黑龙江某高校在无法扩大经费来源的时候，通过预支未来收入来实现改变当下状况的努力，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僵化结构的背景下，只能寄希望于用时间换空间的方法来寻求解决当下遇到的困难。这种预支未来的做法会导致高校未来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降低，实在谈不上高明，但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相信留学生“出口转内销”这块大蛋糕很快就会被各级管理者认识到，并达成广泛共识，最后以政策形式进行控制与分配，毕竟它的潜在收益巨大，而且又可以解决高校普遍存在的运营经费紧张的困境，对于信奉功利主义的管理者而言，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对此我们充满信心。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操作层面不随之进行深入的配套改革，那么，这项改革将造成学生与老师的双重伤害，从而把一项有前途的发展空间彻底堵死。通俗点说，改革的收益如何分配？如果出口转内销的收益不被用于支撑学生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和提升相关服务，增加高水准师资，补偿一线老师的合理利益诉求，那么这项政策很快就会被市场遗弃。以往的大多数改革之所以后来遭到诟病，大多原因皆在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至于质量控制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技术问题，容易处理，毕竟最终选择权在学生手上，如果不能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务和产品质量，市场会选择用脚投票的。

流行多年的赔本赚吆喝的所谓改革可以休矣。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与尝试可以真正倒逼我们僵化的教育体制进行深层改革。一旦时机错过，选择窗口关闭，留给教育界的只能是无尽的挣扎与自救。（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招生市场也需要『出口转内销』

■李侠